

张允熠◎著

中国文化与 马克思主义

Zhongguo Wenhua yu
Makessizhuyi



人民出版社

张允熠◎著

中国文化与 马克思主义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崔继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张允熠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9

ISBN 978-7-01-015114-4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华文化-关系-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8177 号

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ZHONGGUO WENHUA YU MAKESIZHUYI

张允熠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7

字数:415 千字

ISBN 978-7-01-015114-4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上海市交叉学科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专用书

Zhongguo Wenhua yu
Makesizhuyi



新版说明

该书成书于1996年,自1999年1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发行以来,曾一度受到学界的关注,对该书给予了肯定,同时也有一些商榷意见,《哲学研究》曾辟专栏展开讨论。转眼之间,不觉整整16载过去了。人生几何16载?16年来,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已经崛起,其所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然而,拙著于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提出的问题,自进入21世纪之后的15年来,依然故我——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紧要话题,马、中、西三派思想文化之间的互动基本大势未变。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如今已成为学界研究、讨论的热点与焦点问题。因此,应读者的要求和人民出版社之约,本人决定将本书修订后再版。

与16—20年前不同的是:当初有些并不明朗的问题现在愈加明朗,本来有争议的问题现在基本上有了共识。岁月让时代话题更加深化,时间留给了真理自我澄明的空间。比如,该书中认为中国哲学对欧洲近代哲学的形成做出过贡献,这在当时曾引起哗然,成为争歧最大的一个问题。然而,就在当年我写作本书的同时,1998年英国出版了《剑桥17世纪哲学史》,这部积两位主编和数十位学者16年之功的巨著,开门见山在第一部分就分析了17世纪欧洲哲学形成的语境即背景,共分三章:(1)“制度背景”;(2)“知识背景”;(3)“欧洲对非欧洲文化在哲学上的回应——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其在“知识背景”中谈到了17世纪希腊哲学的复兴已由对亚里士多德的高度重视开始转向了柏拉图,而把中国哲学的西传和欧洲思想界对中国哲学的回应单独列为一章加以概述。虽然这一章的内容大部分已为研究者所知,但

它从西方学者的立场有力地佐证了我在拙著中提到的一个观点：在促使欧洲近代哲学形成的过程中，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是两个重要的背景要素和思想资源，关于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只有缩小或夸大的问题，不应存在全盘否定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对于基本历史事实，将信将疑或存有歧见的现象正在减弱。而对于尚未搞清的问题，一方面仍需进行深入、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学界同仁进行平等的交流、商榷和争鸣。

16年来，本人围绕着书中所涉内容又有了一些研究心得，原想在修订时把这部分分章增添进去。但考虑到这样做不仅会大量增加该著的篇幅，而且还会影响到该著的原貌。因此，思忖再三，决定再版时尽量保留原著的原汁原味，而把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整理、压缩成单篇作为“补论”放在书后，增添为第十章，以示时间区隔和新的进展。另外，再版时还就初版做了如下几方面的技术处理：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均采用了最新版本，引文内容相应地根据新版做了修改；《毛泽东选集》四卷本采用了1991年版本，引文内容也相应地根据新版做了修改。

2. 增加了几个脚注。对于个别补充材料，也以加脚注的形式说明。

3. 极个别的表述和行文做了尽量少的调整和增删。

4. 修改了原版中的错字和少数标点符号。

本书在修订再版时，得到了人民出版社马列编辑部尤其是崔继新主任的支持，深表致谢。我的博士研究生龚兵、李旻和硕士研究生孙大盟等人，在电子文本的转换、新版引文出处的查阅和校对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张允熠

2015年元旦于沪上

序 一

欣闻张允熠同志的新作《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一书即将出版,可喜可贺。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但研究起来难度很大,因此,长期以来,国内还没有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著作。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又不能回避。

我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是主张采取分析的方法。儒学中有一部分与马克思主义是矛盾的、不相合的,但也有一部分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可以相合和互相补充。矛盾的部分好讲,互相补充结合的部分不好讲。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强调人格的独立性,这与马克思主义不矛盾。儒家讲“和为贵”,马克思主义从表面上不讲“和为贵”,但从当前的世界发展趋势来讲还是“和为贵”,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可以相互补充。冯友兰先生晚年赞成张载的四句名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冯先生说,前三句马克思主义也是赞成的,有异议的是第四句。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不赞成“仇必和而解”的,冯先生推断说马克思主义主张“仇必仇到底”。我的意见有些不同,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不主张“仇必仇到底”。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复杂,某种情况下应该斗争,某种情况下应该和解,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指出“有些情况下要斗争,有些情况下要合作”,冯先生说法简单化了。“仇必仇到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为贵”与马克思主义也并非不能相容,这里有个辩证关系。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就符合辩证法。邓小平一方面坚持原则,一方面具有灵活性,“一国两制”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创造。

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提法之所以能成为判断问题的标准,就是因为

在当今的条件下,和平发展和经济建设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和为贵”就比较合乎“三个有利于”的提法。儒家有两个基本观点值得注意,其一是主张人格独立,其二是强调社会责任心。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人格独立、人格自由的权利,但每一个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这两个观点至今仍很有价值,都与马克思主义相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没有了解中国哲学?我想他们肯定是了解的,因为自17世纪欧洲人写了许多介绍中国哲学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条件看到。当然,他们的文章中很少谈到这一点。从欧洲哲学史上看,17世纪莱布尼茨、沃尔弗很重视中国哲学,但到了18世纪,康德开始看不起中国了,不过,正像欧洲有人指出的那样,康德哲学与程朱哲学非常接近,都讲理性。尼采就曾说过康德是“哥尼斯堡的中国人”,意思是说康德哲学很像中国哲学。但这个“哥尼斯堡的中国人”却是德国第一个看不起中国人的大哲学家。现在讲德国古典哲学只从康德讲起,而根本不提莱布尼茨,我对这种做法一直不明白。中国哲学对德国哲学的影响是很值得研究的,莱布尼茨很看重中国哲学,从莱布尼茨、沃尔弗开始在德国提倡中国哲学以来,直到康德、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他们都没有放弃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莱布尼茨、沃尔弗推崇中国哲学,而到康德却一反其道,转为鄙视中国哲学了,尤以黑格尔为代表。国家弱被人看不起,人家吸收了你的东西还要转过来骂你。法国的伏尔泰也很推崇中国哲学,但从康德开始,英法哲学家都看不起中国哲学了。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对中国哲学评价很高,以后就不行了。

西方哲学家眼中的中国哲学到底是怎样的?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哲学中没有“理性”,这是很不对的。近代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与中国程朱学派的“理”有相似之处,朱熹的“理”翻译成西文就是 reason,就是“理性”。其中有一个问题很复杂,即西方哲学强调真,而中国把善放在至上的位置。无论真和善,都属于理性的范围。程朱的“性”与西方人的理性也很接近。当然,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讲“理性”,这与近代欧洲哲学所说的“理性”也不完全一样。哲学界不妨可以深入研究:中国哲学中的理性与西方哲学中的理性的同异。古希腊的理性哲学在中世纪有几百年中断了,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发现了希腊哲学。

如何评价西方中世纪哲学,好像也有争议。近年来有一部书,叫《世界

十大思想家》，其中第一个是孔子，还有柏拉图、阿奎那等人。把阿奎那也看成一个大思想家。

黑格尔看过《周易》、《老子》，大概也没有看懂。有一个历史事实：从康德到黑格尔是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反动，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国唯物主义评价比较高。康德是二元论的高峰，黑格尔是唯心主义一元论的代表，黑格尔的“最高理念”或“绝对理论”实际上就是朱熹的“太极”，二者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在莱布尼茨和沃尔弗开创的德国哲学传统中，在当时欧洲的“中国热”中，德国哲学家都间接地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

另外，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应该深入研究，他晚年全部否定儒学，可他晚年以前并不是这样，对儒学肯定的也不少。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问题还没有全部解决，他不懂外文，他一生看的都是中国书，而且大多数都是古书。周恩来曾留学欧洲，他的外文很好。但他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修养，在这点上，他和毛泽东有共同点。那么多留学生在中国都没有成功，毛泽东能成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总之，张允熠同志做的这个题目很重要，能首先选做这个课题，是需要有些理论勇气和眼光的。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重要的是要多掌握资料，实事求是。这确是一个大问题。到了21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一方面继承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要发扬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就是不可回避的了。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有些人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我认为应该提倡“百家争鸣”，可以有不同的见解，谁也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包含着中哲与西哲的比较问题，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最后一句话指出“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如果只继承德国古典哲学恐怕就不够了，中国工人阶级也应该是中国哲学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张岱年

1998年2月

序 二

1994年,已年过四十、有副教授职称的张允熠同志到南开大学来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当时他正承担着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商量博士论文选题时,他有意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结合起来,以“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或“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为题。我考虑到他比一般年轻博士生学识基础宽阔、厚实,又有青年人的朝气和锐气,具备做这个课题的基本条件,就表示支持他的选题意向。我同时指出:这是当前中国学术思想领域里的一个前沿课题和尖端课题,人们的认识很不一致,要用正确的观点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讲出一点新意和理论深度来很不容易。他有知难而进的精神,这是我很高兴、也是我所期待的。

三年后,他写出了30万字的博士论文,颇受评阅与答辩专家好评。1999年初,《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一书正式出版,德高望重的张岱年先生为它作“序”,指出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长期以来,国内还没有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著作”,肯定它有重要理论价值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没有想到该书的出版以及此前发表的《试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脉渊承》一文,被一些人曲解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源说”,在《哲学研究》等报刊上引起争鸣,形成一场不大不小的学术风波。其实张著并没有否定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论断,也没有说过中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只是力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近代思想界以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影响的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吸收和改造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的思想体系。这与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论述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此后十多年来,允熠一直没有放松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为了深入考察中国文化对欧洲近代思想的影响,他还与其弟子一起编译了《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黄山书社,2010年7月出版)一书,在掌握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第一手资料方面下了扎实的工夫,认识也比以前更加清晰和深刻了。时间证明了《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一书的价值。它这次由人民出版社再版,作者又增补了6万多字的第十章,实际上主要是对原书第四章“学脉的渊承”内容的拓展与深化,展现了他十多年来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近日我重新翻阅此书,并重点阅读了增补文稿,觉得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到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确认它是四百年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最高成果。

近百年来,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一个东方大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成为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根据地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典范,这个历史现象引人深思,也非常需要得到合理的解释。本书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动因和机制是中国革命实践对理论的需求,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中国化,除了因应中国社会变革、中国革命实践的历史性需求之外,另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四百年来中西哲学与文化长期双向交流互动的历史性选择的结果。这是贯穿于全书的一条思想主线。因为在作者看来,中国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儒家思想在晚明时期已呈衰落之势,中国主流文化转型的内在动因在那时就已经开始发酵了。比如当时儒学内部就有人发出了“实学救世”的呼声,许多有识之士都尖锐地批评了阳明心学末流空疏误国的学风。适逢其时,西方来华的耶稣会士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哲学、逻辑学。由于当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尚未问世,传教士带来的这些知识大都是源于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发现的希腊文化,如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托勒密的天文学,还有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逻辑学等,但对于中国的知识界来说,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新学”。也就是说,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序幕在16世纪明朝中叶就拉开了。面对西方文化,深受触动的是当时中国的士大夫知识阶层,比如徐光启就提出了“欲求超胜,务必会通”

的主张,此后数百年间,包括戴震的“西学中源”说,魏源的“师夷长技”说,冯桂芬、张之洞等人的“中体西用”说,王韬的“中西融会贯通”说,蔡元培的“中西兼收并用”说等等,无不是主张一方面向西方学习,一方面寻求融通中西文化之道。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中国主流文化亟待转型和“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传入中国的,而且在与西方各种思潮的比较中显示出了其巨大的优越性,所以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并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为什么在万卉纷呈的西方思想的园地中,中国人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者在《自序》中提出的这个问题,答案只能从四百年中西文化交流会通的历史过程中去寻找,并且要注意挖掘其深层的文化背景和学理渊源。

二,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吸收了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成果的科学真理,在逻辑和事实上其中也包括中国文化的要素。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来源问题,国内外的研究者都表达过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看法,但国内学术界一些人却孤立、静止地理解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提法,认为有了这个结论就不能根据历史事实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来源问题做视野更广阔、内容更深入的探索研究。实际上,列宁讲的“三个来源”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的三个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直接的来源基本上是比较马克思稍早(18世纪后期)和与马克思同时代(19世纪)产生的欧洲思想文化成果,并未包括“资产阶级时代”的一切“最宝贵的成就”,也不能包括马克思主义生长于其上的深厚的人类思想文化渊源和一些间接的理论来源。正因为如此,列宁又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列宁的这段话,是对他的“三个来源”说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的补充。既然“三个来源”指的是直接来源,那么,“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指更广泛的人类思想文化根源,也包括一切间接的来源。在这里,列宁只是指出了探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

讨这一问题的方向,并没有具体展开论述,“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它所包涵的探索研究空间是很大的。《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一书旨在说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深厚的人类思想文化根源和间接理论来源中也包括中国文化的因素,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找到大量证据,做了一些具体的史料搜集和考释工作。应该说,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有利于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人类思想文化成果的内在血脉联系,也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精华的进一步深度结合。

三,深入挖掘在欧洲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热”中,中国哲学对欧洲近代哲学形成的潜移默化影响,以说明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间接影响。

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史,人们谈论得最多是“西学东渐”,这是近代以来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深切感受到的客观现实。但是,如果只是把中国定位在文化双向交流的被动接受的一方,显然也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全盘西化”论者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连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人类的贡献都要刻意抹杀,他们更不愿正视中国文化在“中学西传”中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了。事实上,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已把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包括儒道的主要经典都传译到了西方,在欧洲形成了将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热”。许多第一流思想家都高度重视甚至迷恋中国文化,“一直到18世纪中叶,一般都认为中国远胜于欧洲”,“有关中国的知识已成为文化界的常识”^①。中国哲学对欧洲近代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无可否认的深刻影响,至少已成为17至18世纪欧洲近代哲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朱谦之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哲学传入欧洲促成了欧洲文化由神学时代进入哲学时代,这个促成文化转型的历史性贡献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他在《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中对此做了粗线条的介绍,但未展开深入论证。张允熠在《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一书的第四章中,尤其是在后来增补的第十章中,不仅补充了大量最新资料,而且还对西方近代哲学中的自然神论、有机论哲学、实践哲学、理性与纯粹理性、绝对理念、“正反合”辩证法等主要理论观念,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探赜溯源,具体揭示其所受中国哲学的

① [美]埃德蒙·莱特斯:《哲学家统治者》,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

影响,广征博引,有理有据,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该书还提到了1998年英国出版的《剑桥十七世纪哲学史》,这部完全由英美人编写的权威性哲学史著作,在其《导言》中把欧洲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回应,当作欧洲十七世纪哲学形成的三大背景和前提性条件之一,从而还原了欧洲近代哲学形成过程中深受中国哲学影响的基本事实。还原这一哲学史实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西方文化背景中有不容忽视的中国因素,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哲学对欧洲近代哲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表现在由“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所开创的德国哲学传统中。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到康德、黑格尔,中国哲学元素实际上已经内化即“欧洲化”为西方近代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了。中国哲学通过欧洲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间接影响,应该说是有迹可寻的,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应给予充分肯定。

四,“补论”对马克思中国观的研究,比以前更加丰富和深入了,有助于中国人民了解马克思这个世界历史伟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

从16世纪开始的“东学西渐”进程,到19世纪,由于中国在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实力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均已落后于西方,一般欧洲人的潜意识已由崇拜中国转变为鄙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不能不受到这种“中国观”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专制政治制度和宗法道德都有一些尖锐的负面评论。但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注意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预言中国革命将会对世界革命做出先导性的贡献。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人民出版社曾经出过《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资料摘编,有的学者围绕着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也发表过一些关于马恩论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和天平天国运动)的文章,但是像张允熠这样,根据大量第一手资料,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过去确实还没有见到过。他引用的马恩原话均来源于马恩全集,其中许多是《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不曾收录的。比如,我们从中获知马恩在特定条件下提到的“中国人”三个字,通常就是指“孔夫子”,像“完善的中国人才是共产主义者”,即是说孔夫子才是共产主义者。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引用法国人卡贝的

一段话：“请听！我不来对你们谈及许多实行过财产共有制的古代民族！也不来谈及希伯来人……莱喀古士和毕达哥拉斯……孔夫子和琐罗亚斯德，最后两人之中，前者在中国宣布了这个原则，后者在波斯宣布了这个原则！”在这里，他们又一次把孔子当作共产主义思想的奠基者。张著还让读者了解到，恩格斯早在1839年就指出孔子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具有相似性——同属“泛神论”。比如他说：“现代泛神论，也就是说，黑格尔，在中国人（孔夫子）和教徒那里已经可以找到……。”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点”，并非偶然，因为他们早就注意对这两种哲学做比较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中国的言论，大多散布在他们不同时期的著述中，虽然是一些零星议论或只言片语，但汇集起来就能反映出马恩中国观的概貌及其形成的心路历程。有意思的是，该书还让读者了解到，中国文化元素甚至已融入马克思的家庭生活中：他给自己的两个爱女分别取了两个中国绰号，大女儿小燕妮叫“高贵的中国人”，小女儿爱琳娜叫“中国皇太子古古”。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中国的议论，即使是对中国人道德的一些负面议论，今天的中国人读来仍感触尤深，我们如能从这些负面议论中汲取有正面价值的东西，那么对于正确扬弃中国传统文化、推进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都十分关切的一个世纪之问。它包涵的内容极其丰富，理论、历史、现实交织在一起，需要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立体研究。一方面“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需要做出科学合理的说明；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落户又需要有丰厚的文化土壤来培植和滋养，马克思主义之“魂”必须被中国文化之“体”所接受，才能在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起到指导思想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与新生也需要当代先进文化来引领，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激活其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精华，批判和清除其封建性的糟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在途中，因此这一研究也没有止境。张允熠对这个问题的富有个性特征的研究，已经在学术史上留下鲜明的足迹，他的大著增订新版问世，将继续经受历史的检验，包括接受学术界的批判审视，不论它将

得到怎样的评价,我认为都是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有益推进。他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对这个课题进行二十多年持续研究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是我多年来思考和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我是从“五四”后中、西、马三“学”的关系来切入这个问题的,认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是近百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的一条现实道路。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综合”,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是文化综合创新论和“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核心问题。

“马魂、中体、西用”论与我们党一贯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是高度一致的。比如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兴国之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四项基本内容之一,在分别为“灵魂、主题、精髓、基础”的完整理论体系中居于“灵魂”的地位。文件中也有“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论述。在讲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时,强调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也就是说,在这个重要文件中,“马魂”、“中体”、“西用”都讲到了,马、中、西分别处于“灵魂”、“主体”和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的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思想文化问题有一系列重要论述,其基本精神也是“马魂、中体、西用”,特别是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他是从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高度来看这个问题的,一再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学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干部的看家本领。同时他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我们要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些论述,对于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

的关系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张允熠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与上述精神是完全契合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坚持“马学为魂”)与中国文化本位立场(坚持“中学为体”)的统一。这种研究立场,除了本书外,在他的《马魂、中体、西用:传统话语转换中的新拓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中国文化哲学构建的三大话语平台》(《学术界》2008年第4期)等文章中也有充分体现。我希望他把这个做了二十多年探索性研究的课题继续深入下去,更加切近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的实际,具有更加宏阔的理论眼光,为深刻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这个“世纪之问”做出更大的贡献。

方克立

2015年5月30日